

文化症候与 文学精神

张伯存 著

Zhangbocun zhu

WENHUA ZHENGHOOU YU WENXUE JINGS

上海三联书店

文化症候与

文学精神

张伯存 著

WENHUA ZHENGHO
YU
WENXUE JINGSHEN

G0
2h9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症候与文学精神 / 张伯存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7. 10

ISBN 978-7-5426-2622-6

I. 文... II. 张... III. 文化—研究 IV. G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7537 号

文化症候与文学精神

著 者/张伯存

责任编辑/张大伟 邱 红

装帧设计/鲁继德

监 制/李 敏

责任校对/大 卫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 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640×960 1/16

字 数/220 千字

印 张/14

ISBN 978-7-5426-2622-6

G · 857 定价: 28.00 元

从文学批评到文化研究(代序)

似乎可以说,我是一名以文学教学和研究为职业的人,自然地,我要有一个文学观,有对研读对象的取舍标准。我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是对一个时期的社会生活的精当反映,更应该致力于成为人类历史文化长河的载体,不仅具有当下性、时代感,更应具有历史性、距离感;不仅表现一地的人情物事,更应该致力于追求与异国他乡的人们的心灵、情感的交流与融合,不仅要有在地性、民族性,更应该有“去区域化”的世界性;不仅要如神地描绘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画卷,更应该致力于呈现人类广袤、深邃的心灵世界和存在本质,表征人类智者哲思的高度;优秀的文学作品还应该表现出对社会、历史、文化清醒、冷静的反思意识和批判精神。同样重要的是,优秀的作品除了具备丰富、复杂的思想蕴涵之外,在语言、文体方面应该表现出独特的诗意和美感,一种语言的陌生化和艺术性,对形式美的不竭追求,对无数读者构成心灵的震撼、情感的享受和审美的愉悦。以这样的标准衡量,我的批评对象存在着这样那样、多多少少的不足甚至缺陷,但毋庸置疑,他们是中国当代作家中的佼佼者,在某些方面达到了中国当代文学能够企及的高度,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的作品已经成为当代经典。

我向往和追求这样的文学批评——如果当初只是一种朦胧的意识,那么,现在省思起来,可以表述为:与作家心灵的默契沟通和对话,如友人品茗清谈,或者是擂台上辩手相遇,话语的交锋、辩难;文学批评应该是独立的主体意识的高扬,尽管“我批评的是我自己!”之类的宣言不无偏激,但这样的批评观在底线上与媚语媚俗绝缘。文学批评需要主观的、情感的投入,更需要客观的、理性的判断与分析。选择即批评!卡尔维诺对经典的十二个定义其中之一是:“它使你不能对它保持不闻不问,它帮助你

在与它的关系中甚至在反对它的过程中确立你自己。”^①一个优秀的文学批评者在批评对象的选择、批评意识的阐发上,应该表现出感觉的敏锐、思考的深邃、理性的清明、语言的锋芒。更重要的是,一个优秀的文学批评者不仅是美和诗意的欣赏者、阐释者,更应该具有人文精神和人间情怀,表达对社会的关怀和建构,他是在公共文化空间中发言,他应该具备公共意识和批判意识,他应该是一个秉承人文主义传统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的笔底应该裹挟风雨和雷电。

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我的文学批评文字,当然是不尽人意,有着种种不足,但我并无愧意,因为我是真诚地写作每一篇文字,我的文学批评致力于呼唤一种清明、省思、自由的文学精神。

但近年来,我的研究志趣越来越从文学批评转向文化研究,细究起来,原因是复杂的。

一、时代生活角度

与充满勃勃生机的大众文化相比,自1980年代以来一度繁荣昌盛的纯文学,逐渐变得黯然失色。尽管每年文学作品出版的数量是惊人的,但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水平差强人意,资本的逻辑和消费文化严重侵蚀着中国当代文学,有的文学现象毋宁说是大众文化现象或娱乐文化现象,市场的魔力令大部分作家心绪不宁,意乱情迷,难以保持一种良性、平和的创作心态。这样的文学在浮华、热闹背后掩盖不住深层的危机和悲凉感,这样的文学已难以激起文学批评者的热情、激情,一批有才华的文学批评家弃文学而去,只留下作家们自娱自乐。而一部分固守文学的研究者也在日益细密的学院体制束缚下做着“经院式”的研究。

遥想1980年代,一部小说就能一时洛阳纸贵,万人传诵,那是文学的盛世,文学的黄金时代。文学处于时代生活的中心,文学批评处于时代思想、精神生活的前列,1980年代的文学批评是和“人的本质的现代化”、

^① 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人的解放”、“主体性”、“美学革命”等当时的重大思想、精神问题密不可分的。正如蔡翔教授所言:“在某种意义上,80年代的文学批评走在了当时整个思想解放运动的前列。但是近十年来,中国一些重大问题的提出,几乎都和文学批评无关,它的思想活力在逐渐衰退,提出问题的能力似乎也在丧失。”^②

1990年代以来,文学似乎已被抛弃,不再属于社会文化生活的中心,越来越被边缘化了,与广阔复杂的社会生活日益隔膜。这样的“失去轰动效应”的文学,也就意味着对社会的影响力已经很微弱,很难参与到良性的文化建设中来,文学研究已无法揭示这个时代的文化精神特征,无法与时代生活产生良性互动,更无法以积极的姿态创造性地介入时代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这对一名不愿躲到书斋里做职业化的文学研究、屈从于学院政治、隔膜于社会生活而秉持公共关怀的知识分子而言,无疑是痛苦的。

就文学来说,当今的文学很大程度上已不再是一种语言符号和语言艺术,更重要的是一种表意的社会实践。如果说1980年代的文学追求精神自由、美学解放、形式实验,作家们呼吁并践行“纯文学”、“回到文学本身”,那么,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又重新陷落到复杂的社会现实的包围圈中,遭受到政治的挤压和胁迫,而此时的“政治”已不是1980年代要极力摆脱的那种政治,它是一种神通更广大的“生活政治”。当前的文学批评必须及时跟进,勇于戳穿这样的“硬壳”,而不应拘囿于“80年代传统”的文学批评模式,这样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挽救文学。“纯文学”其实是1980年代的一种文化政治策略,是一种政治性的表达,文学从来不是本质主义的,而是一种历史主义的建构过程。文学评论家李陀指出:

由于对“纯文学”的坚持,作家和批评家们没有及时调整自己的写作,没有和90年代急速变化的社会找到一种更

^② 《美和诗意如何产生——与蔡翔对话》,见王晓明著《思想与文学之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0页。

适应的关系。很多人看不到,随着社会和文学观念的变化与发展,“纯文学”这个概念原来所指向、所反对的那些对立物已经不存在了,它不再具有抗议性和批判性,而这应当是文学最根本、最重要的一个性质。虽然“纯文学”在抵制商业化对文学的侵蚀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它使得文学很难适应今天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不能建立文学和社会的新的关系,以致 90 年代的严肃文学(或非商业性文学)越来越不能被社会所关注,更不必说在有效地抵抗商业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侵蚀的同时,还能对社会发言,对百姓说话,以文学独有的方式对正在进行的巨大社会变革进行干预。^③

可惜这样的反思为时太晚,并且也没有在文学评论界引起足够的重视,形成整体性的反思。对文学的如此要求并不高,甚至说并无新意,但显然已不合时宜。原因在于时代的社会生活已发生巨大变化。

1990 年代起,中国第二轮市场经济改革迅速启动,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日益加深,在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务日益国际化,“与国际接轨”成为流行词汇;互联网、克隆等科技的日常化运用、普及,导致社会和文化再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消费主义、大众文化、市场意识形态的兴盛……诸种因素构成中国当代文化研究迅速崛起的历史动因和主要背景。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复杂进程、动因、结构以及作为表象的种种现象、问题,迫切地需要人们作出合理的解释、理性的分析和深入的批评,文化研究提供了回应、剖析这些复杂问题的可能性。

面对如此复杂、严峻的社会现实,任何一个具有人文关怀的知识分子都会深深地感受到精神上的刺激,它在挑战着我们传统的知识结构和僵化的学科建制。

正是为了纾解自身精神上的刺激,不满足于自身单一的知识结构,不

③ 李陀与李静对话录《漫说“纯文学”》,《上海文学》2001 年第 3 期。

愿令自己躺在学科体制下做一名名正言顺的职业化的文学研究者,我开始接触文化研究理论,我不愿让自己的批评文字只是简单的量的积累,自我重复,而是跨越专业的樊篱,做一个“业余者”。萨义德指出,“知识分子是社会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人,不能只化约为面孔模糊的专业人士,只从事她/他那一行的能干成员”;“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在针对知识分子的压力中,首推“专门化”,在研究文学时,“专门化意味着愈来愈多技术的形式主义,以及愈来愈少的历史意识”,“专门化也戕害了兴奋感和发现感,而这两种感受都是知识分子性格中不可或缺的”。^④从法兰克福学派到伯明翰学派,阿尔都塞、葛兰西、罗兰·巴特、萨义德以及一批活跃在当代文化研究领域的学者,他们身上无不体现出一种敏锐、开放、鲜明的批判意识和学术精神,文化研究介入社会现实,破解各种压抑性、支配性的权力关系的学术志向令我兴奋。面对当代中国复杂而严峻的社会现实,面对这么一个方死方生、方生方死的“大时代”,我开始尝试观察它、认识它、解读它。

二、学科角度

从文学批评转向文化研究,并非是越界之举,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二者有着内在的、密切的联系,在文化研究身上有着文学的“胎记”。一个显而易见的例证是,开创文化研究的威廉斯、霍加特、汤林森、霍尔都是文学批评家或理论家。其后的女性主义文化研究者、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者斯皮瓦克、霍米巴巴、萨义德等也都是文学理论家或文学批评家出身。而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文化研究者们当初的一个理想或共识就是扩大文学批评的范围,从文学出发,突破文学的边界,进入和日常生活有着密切关系的领域:工人阶级的特征、青年亚文化、大众媒体、消费主义等等。

^④ 萨义德:《知识分子论》,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6页、67页。

从方法论角度说,文化研究极大地得益于文学批评所谓“内部研究”的语言学、符号学等文本解读分析方法。但文化研究与文学的审美研究的根本差别在于它们解读文本的目的、旨趣不同,文化研究的出发点或目的主要是揭示文本(文义上的)的意识形态蕴涵以及文本所隐藏的权力关系。

从根本上说,文化研究不是一个学科,尽管它已经或正在被学科化,文化研究是一种跨学科的学术实践。它的跨学科性或者说“反学科性”可以作如下理解:首先,知识建构、学科建制并不具有客观的科学性和唯一性,它既不等于人类知识的内在必然特征,也不等于世界的内在必然特征,它只是种种话语的一种,在这种话语的建构之中取得的优势地位是和权力的运作分不开的,表征出权力的话语和话语的权力,比如,“文学”的标准和分类,“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确立和发展,因此,这样的知识建构和学科建制是靠不住的,是应该并且能够打破的,文化研究正是努力践行这一点:拒绝陷入到既有的知识分类,挑战学科壁垒。其次,在实践中,它挑战的是学科的运作方式,与每一门学科都用权力规定好自己明晰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式不同,文化研究恰恰要抹平学科界限——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论上,使之重新模糊化,如1957年,霍加特潜心研究十年之后推出了文化研究的经典之作《识字的用途》,这是一本至今仍在重版的书,当时许多人都撰写了书评,展开热烈的讨论,但人们无法把它划归到某一个学科领域。再次,文化研究并不追求整体性和普遍性的权力,恰恰认识到自身的有限性和适度性,并在此基础上打开新的知识路径,更主要的是积极介入现实的可能性和有效性。

根据雷蒙德·威廉斯的定义,文化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他把文化理论定义为“是对整体生活方式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分析文化就是去发现作为这些关系复合体的组织的本质”。^⑤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研究将整个社会文化看作是一个巨大的“文本”,这就意味着原有

^⑤ 雷蒙德·威廉斯:《文化分析》,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0页。

的学科分类对于解读这样的极其复杂的“关系复合体的组织”文本显然力不从心。因此,文化研究成为科际整合的契机,成为文学、社会学、传播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领域的学者共同的课题。

文化研究作为一个跨学科的学术探索,有助于打破学术话语的生产与社会公共领域的日益严重分离的状况,促使重建学术研究与中国本土问题的联系,是一种参与社会变革的文化实践。当下性、跨学科性、批判性、实践性成为文化研究自觉的选择。

三、个人因缘

王晓明先生曾谈到自己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这一学术转向的心路历程:1980年代的时候,对整个世界、对中国社会有一个很明确的判断,中国应该走开放的道路,走西方的道路,走现代化的道路。而特定的政治风波、苏联与东欧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彻底的巨变、1990年代以后中国开始的新一轮的市场经济改革以及随后整个世界大局的变化,对个人造成强烈的精神冲击,所有这些事情结合在一起,使思想发生了变化,先前的自信和确信就破灭了。而要重建世界观,首先是要了解今天的现实。看看当代中国社会是一个怎样的变化,他谈到对当代社会感受特别深的两个方面,第一,我们这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这些领域都搅和在一起,甚至可以说,它本身就是一个东西;第二,我们现在整个的社会生活当中,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价值因素越来越不重要。所以,他就觉得,我们特别需要一种能批判性地关注当下的问题,能够不受我们的学科的、知识的边界限制的,批判性地分析当下现实的一种学术、思想活动。因此,他转向文化研究。^⑥

贺照田将那么多在1980年代表现优异的文学学人在1990年代不期而然地转向其他知识领域,将文化研究在当代中国文学界遭遇到的令人

^⑥ 王晓明:《现代性视域中的学术研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青年教师讲座》2005年3月26日,当代文化研究网2005年11月22日。

吃惊的热情,归结为文学批评的“历史有效性”的丧失,“历史有效性问题变成了困顿 90 年代无论是执情于观念,还是偏情于知识的敏感文学学人内在感受的核心要素”。他指出,包蕴着理想主义精神、人道主义关切和历史、民族责任感的历史势能的 1980 年代的文学学人,在 1990 年代“人文精神”讨论寻找新的历史着力点的努力之后转向文化研究,是与他们“认为文化研究能有效承担剖析与批判现下试图以市场意识形态重塑一切的现实这一看法有关。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相当一部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人士转向文化研究,其实正是上述历史势能在文学上丧失自己的有效立脚点之后,重新寻找具有历史有效性的新的着力点、开展点的一种必然表现”。^⑦

吾生也晚,不曾遭遇到这样深刻的思想危机和认同危机,在寻找有效立足点上也没有历史的重负和焦虑。但我是 80 年代文化的产儿,80 年代文化意识和氛围哺育了我,我至今清晰记得在我当时就读的一所偏僻的大学门口抢购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出版社印行的“文化哲学丛书”的情景,卖书的也是校内在读的大学生,这就是他们的“下海”,这是纯净得一尘不染的“海”。80 年代文化遗产的清理、总结是一个历史课题。80 年代文化子民在 90 年代以后日益分化,不少人分道扬镳,“道不同不相与谋”,但在文化、思想、学术等领域孜孜以求,崭露头角,成为中坚力量者,往往得益于他们 80 年代以来的历史经验和文化立场。愚顽如我者,从事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的转向很大程度上受益于 80 年代形成的精神资源和文化气质,80 年代文化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血缘,我们与 80 年代文化英雄、精神导师的学术转向一脉相承。这与更加年轻的从事文化研究的同道相比,还是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小小的代际差别。

因缘际会,并不年轻的我负笈沪上,是这个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和导师的熏染,促使我最终转向文化研究。当我写作文学批评文章时,对文学的理解是乐观的、理想主义的,葆有批评的热情,因此,我曾长时间沉浸在

^⑦ 贺照田:《后社会主义的历史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观的变迁》,《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8 页、71 页。

王小波的文学世界里,对莫言等作家作品给予充分的阐释,意在呼唤一种高贵的文学精神。而当我转向文化研究时,对大众文化现象投以审视的眼光,看作种种病灶的表征,是对文化“症候”的望诊、切脉。其间有研究主体的内在的心路相通,这两个方面是辩证统一的。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两个方面更是一以贯之。本书中的文化研究文章,均为一种派生于文学批评的文本解读,侧重于符号分析和话语分析,意在揭示话语、叙事和种种符号体系生产意义的机制及其背后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的特定历史主体的话语建构和社会建构。如“成功人士”、“80后”、男性时尚杂志、消费文化等,而《韩少功直面生活和破解世界的〈暗示〉》、《“80后”写作:从早熟到早衰》这两篇文章更是用文化研究的方法进行文学批评的尝试。与基于生产的文化研究和对活生生的文化的研究(即民族志式的研究)模式相比,这种基于文本的研究有着理查德·约翰生所谓的“结构主义的简缩”的缺陷,这与我的学科背景大有关系。而根据斯图亚特·霍尔的概括,文化研究有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范式,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后一范式中起到关键作用,本书对“新意识形态”运作机制及其表征的初步分析受惠于此。

就中国当代文化研究而言,既避免成为一时的西方理论旅行的学术时尚,又避免被学科体制“收编”,成为它僵化的组成部分;既避免被它所批判的对象吸附、同化,又避免单纯的理论操练和话语生产的游戏。诸如此类的“陷阱”是文化研究者必须清醒地面对和设法绕过的。利用西方理论资源进行文化理论创新,执着地研究中国的文化问题,并与进步的、创造性的社会文化实践相结合,是中国当代文化研究的重大使命,任重道远。笔者愿负重前行,以尽绵薄之力。

目 录

从文学批评到文化研究(代序)	1
“成功人士”、召唤机制与社会想象	1
消费文化的隐秘逻辑和商品拜物教	10
从征婚广告看社会变迁	28
从视觉文化看时尚男性杂志中的性别政治	42
“普天同庆”的千禧年?	46
“三高”过后尽开颜?	51
“80后”写作:从早熟到早衰	59
韩少功直面生活和破解世界的《暗示》	73
文化认同、家国救赎和文明寓言	83
莫言的文学民间世界	92
刑场上的狂欢节和历史主体的锻造	114
当代小说的精魂闪光	124
王小波的人生哲学及其小说的精神特征	129
王小波的精神结构及其小说的结构艺术	140
王小波小说的身体政治学和对抗性游戏	149
王小波小说的死刑游戏和狂欢化诗学	161
一个后现代主义文本的解读	173
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世纪绝响	181
余秋雨和董桥:文化散文的精神寄托	191
都市文化和香港文学	199
精神还乡不平路	205

“成功人士”、召唤机制与社会想象

任何时代都需要时代英雄,而中国是一个擅长“造神”的国度,一个新的“造神运动”在 1990 年代后期起逐渐紧锣密鼓、声势浩大。这就是“成功人士”神话。^① 而男性时尚杂志在其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它们通过年度人物评选之类的文化活动实践着新的意识形态掌控。

《时尚财富》的年度人物是清一色的财富英雄。它的卷首语往往充满着锋芒毕露、自我激励的张扬:“评选 2003 年度时尚财富风云人物,就是要为当代英雄扬名立传,为我们身处的这个锦绣时代锦上添花。我希望能将这一评选每年一度,不间断地连续下去,这是社会的需要,也是自我催发!”^②《mangazine·名牌》评选年度十大精英男性的目的,是通过他们的榜样意义,“有助于人生价值的回归,有助于社会走出茫然”。^③《时尚先生》2004 年举办了首届“中国时尚先生”评选活动。该刊主编对这次活动的目的、标准做了如下的阐述:

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弘扬和树立时代的榜样、男人的楷模。我们今天所要评选的“中国时尚先生”就是真正的时尚俊杰,生活在各个方面都展现出时代特征具有光彩魅力的男人,通过树立这样的男人典型,启发和吸引更多的人做真正的现代化的人,过真正时尚的生活。这是我们评选的标准和目的。

① 蔡翔:《广告乌托邦》,见《回答今天》,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王晓明:《半张脸的神话》,见《在新意识形态笼罩下》,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② 《时尚财富》2003 年 11 月号卷首语《英雄辈出》,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③ 《mangazine·名牌》2004 年 12 月号卷首语《精英意义与杞人忧天》。

几种主要时尚男性杂志在“成功人士”的打造上不遗余力,由零散走向集中,由泛化走向具体,“成功人士”的面容越来越清晰、标准越来越高,他们对大众的召唤力也越来越强劲,这些被创造出的主体会不断地召唤出新的主体产生,即广大的时尚媒体受众。

男性杂志展示的大批成功人士的辉煌事业、美妙生活构成一个光鲜、绮丽、浮华的“景观”,它对普通读者的吸引力、召唤力是可想而知的。从杂志读者来信中可以管窥到这种召唤的效果,这些读者一是希望得到一种提高品位、修养的自我修炼术;二是希望借鉴“成功人士”的经验;三是通过“成功人士”的成功经历获得自我激励机制。(如《时尚先生》2000年第7期一位读者来信写道:“一个人的生活是否快乐,在于其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而贵刊的‘生活方式’专栏,则为我们提供了全方面的考虑,使我们找到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人物’专栏则使我们从那些成功人士身上得到启示,有了更多的领悟。使我们在人生旅途上更有信心有把握地前进。”)从这些读者来信中,可以看出一种明显的“他人引导型”人格特征。^④

男性时尚杂志的主人公和读者通过外在的服饰、气质向别人传达信息来定位自己,创造并维持自我身份。个体的身份问题成为一个对个人形象进行选择的问题。外表、形象、风格以及气派等构成了身份认同性。就是说人们的自我认同和相互辨识不再取决于门第、血统、阶级等传统的标示,而是取决于形象的包装、象征性消费以及符号的操纵。通过对商品的征用,产生自我身份的想象性提升。在这一认同性建构和社会化区分过程中,阶层化的时尚杂志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它们源源不断地提供构建认同性的资源和材料。这是一种关乎日常生活政治的媒体政治学。从时尚杂志通用的符号、话语、鼓吹的形象及其形式——审美因素、受众的设置等能够看出意识形态立场及其效应。时尚男性杂志正是以“成功人士”为主要符号建构起新的意识形态。

从男性时尚杂志的读者收入数据上可以看出这种意识形态的效应。

④ [美]大卫·理斯曼:《孤独的人群》,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时尚·Esquire》读者中,年薪6万~12万元占48%;《mangazine·名牌》读者中,年薪8万~15万元占42.1%,就是说,所谓的中产阶级比例占到近一半,他们是最有希望也最盼望着成为“成功人士”的群体,或者他们就自认为是“成功人士”,他们是这类杂志的目标读者;这两份杂志的读者中,年收入4万元以下读者也占有一定的比例,这一点尤其值得关注,这类人一般是工薪阶层,在他们身上更能体现出新意识形态的功效。当今有这样一种说法:报纸提供资讯,电视用来娱乐,杂志区分阶层。但是,即使男性时尚杂志这样的高价位读物,不仅没有“剔除”掉工薪阶层,反而牢牢地吸附住一部分工薪者,他们和中产阶级以上的读者一起构成了时尚杂志的阅读共同体,他们通过阅读时尚杂志,了解“成功人士”的人生经验、生活方式,效仿他们的兴趣、品位,梦想着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他们通过对时尚媒体的阅读行为建构起“想象的共同体”,通过对媒体文化形象的占有,创造出个人和群体的认同性,分享着“成功人士”的幸福生活。更进一步,他们也能够通过生活上的时尚追求和模仿消费参与到“想象的共同体”中来。

男性时尚杂志的阅读共同体越来越表现出一个特定群体的“类”的特征,而不是一个空泛的、无名的虚指,他们在生活消费方面享有一定的共同的价值观念。时尚媒体和目标受众之间存在着编阅互动,更确切的说法是吸引和被吸引、召唤和被召唤、想象的世界和想象的认同的关系。

这些众多的读者以时尚杂志推崇的“成功人士”为偶像,与之建立起一种“想象性关系”,^⑤从外在层面看,“成功人士”的蛊惑力主要作用于日常生活领域,作用于吃穿住行等生活细节中。“成功人士”在物质性方面表现出强大的魔力,如何发迹、理财、穿衣打扮、游玩、住房、汽车、形象、气质等等。时尚杂志的目标受众关注的往往是“成功人士”的消费行为和外在形象,并进行刻意模仿,在想象中成为“成功人士”,或者说,看起来像“成功人士”。从主体角度看,这种想象性关系是心理和情感上的体验、感受、联想、幻觉、无意识,是一种“误认”,建构了一种与其真实生活处境不

⑤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相符的幻象,是对真实现实的“否认”和想象性置换,这种想象成为建构身份认同和被“召唤”的心理基础。一种“主体召唤”的机制建构起来。“成功人士”犹如一面面镜子矗立在那里,主体发现了自认为完美的自己的影像,映照在“成功人士”的“镜子”中,有了这种想象的自我的形象确认,主体就能够以适当的社会方式行动。

这样的主体,其实只是承载欲求和意愿的载体,是被诱惑、召唤、挟持、控制的欲望的载体。

而他又是自由地、心甘情愿地、发自内心地效仿和追随男性时尚杂志里的“成功人士”,其中没有任何被强迫的迹象,一种内化了的吸附力量建构起“成功人士”召唤出的主体性,它根植在主体的内部,往往使主体产生无意识的反应,这是他心灵的自我呼唤,生活的目标和方向,不再是外界提供的,更不是强迫的,而是自我的自觉意识,自觉追求,生命价值的“自我实现”。

作为新意识形态传播者、践行者的男性时尚杂志和各类大小传媒率先构建出一批“主体”——“成功人士”,再通过他们的“美丽人生”召唤读者,这些读者在阅读行为中不知不觉又被召唤成了同一种类型的主体,向往成为“成功人士”,积极主动地追求杂志中展示的生活方式。接受这一召唤也就意味着臣服于它,被套牢在权力关系的链条上无法脱身,在成功的梦幻中成为新的权力的祭品。这是一种新的权力结构,杂志中的“成功人士”和月收入数千至几万的小资、白领、中产阶级读者构成了一个统御—顺从的主奴结构型,而读者一旦接受这种召唤,便自觉不自觉地认同“成功人士”的角色,仿佛自己就是、已是“成功人士”,穿着、礼仪等外在包装的“拟真”更强化他们的“虚幻的自我”意识。而这些白领读者同时在他们生活的周围又扮演了时尚杂志中的“成功人士”的角色,由被召唤者变成召唤者,就是说每一个主体都同时扮演着被召唤者和召唤者的角色——互为镜像,既是这一符号的接受者,又是它的传播者、代言人。这种镜像复制机制在主体生活的各个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地发生着。这个镜像结构是多重性的。于是有了涟漪效应,从中心波及开来,“成功人士”的符号、话语在社会上传播开来。